

# 唐代石堡城、赤岭位置及唐蕃古道再考<sup>\*</sup>

李宗俊

《新唐书·地理志》、《通鉴》胡注等,对于唐代石堡城、赤岭地理方位的记载是错误的。依此二书记载,学界曾误将唐石堡城的位置确定、标绘在今青海省日月山附近,而对于赤岭即今青海日月山,及其为唐蕃古道必经地之说更是先后相袭,以讹传讹。其实,唐蕃古道在陇右本有南北二道,石堡城、赤岭皆在唐洮州境内,分布在河州、洮州至河源通吐蕃的南道上,该道为唐蕃往来时常取的一大道,而且自唐至明清,一直对该道及其副线沿袭使用,未曾中断。《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应该是掺和了几条唐蕃道的内容,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对其出处和所记内容出现混乱或语焉不详的原因,需要进一步考证,所涉各地名方位亟待考定。

关键词:唐代 石堡城 赤岭 唐蕃古道

作者李宗俊,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地址:西安市,邮编 710062。

唐前期,在唐与吐蕃的战争中,石堡城是双方殊死争夺的军事战略要地。对于其方位,很多学者曾继承了《新唐书·地理志》及《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胡三省注的说法。可是,近代以来,随着一些文物的出土和甘肃省卓尼县羊巴村石堡城遗址的发现,曾有学者对唐石堡城是否在今青海日月山附近提出质疑,并引起了争鸣。遗憾的是,尽管有此争鸣,至今在许多学者的著述及相关的历史地图中仍基本沿用了传统说法,将唐石堡城的位置确定、标绘在今青海省日月山附近,而对于赤岭即今青海日月山,及其为唐蕃古道必经地之说更是前后相袭,以讹传讹。然而,笔者将文献记载与唐蕃关系、军事地理的大背景紧密结合,尤其与新出土文物与实地勘察紧密结合,考证发现唐代石堡城、赤岭位置皆不在今青海日月山,而在唐洮州境内,历史上的唐蕃古道也并非一条。

## 一、对史籍所载石堡城位置的质疑

对于唐代的石堡城位置,《通典》卷 172 陇右节度使目、《唐会要》卷 78《诸使中》节度使条、《新唐书·地理志》卷 40 鄯州西平郡条、《通鉴》卷 213 开元十七年(729)条胡三省注都有记载。从这些记载可知,唐振武军治所,即原吐蕃石堡城,又称铁仞城,地当吐蕃东经青海湖东,进入湟水流域唐鄯州境的大道,地势高峻而险要,为唐蕃数度兵争的要隘。其驻军的建置沿革为: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敦煌吐鲁番民族与边疆史地文书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1XMZ01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开元十七年归唐后置振武军,二十九年没吐蕃,天宝八载(749)唐复克之,更名神武军,后或再改天威军。对于振武军所在的吐蕃石堡城地势的险要与唐蕃双方为此争夺的激烈,《通鉴》卷216 天宝八载有关内容及两唐书《王忠嗣传》的记载均可清楚看出。但二书均无记天威军一事,严耕望先生考证言:“唯新书《兵志》作天威军,与新书《地志》同。盖先名神武,终改为天威耳。”对于《唐会要》卷78等所记信安王祜所置之振武军,严耕望先生继考言:“此与《新地志》河州有振威军非一地。据上引《新地志》,振武军在鄯州西南三百零七里,里距略同,方位亦略合,又皆为开元中信安王祜所置,疑即一军,‘威’乃‘武’之形伪耳。”<sup>①</sup>而对于石堡城的方位,据严耕望先生的考证及近年撰修的《青海通史》,都将其定在今青海湟源县西南日月乡境。<sup>②</sup>但是,笔者考证后得出,以上史书所记的赤岭石堡城位置或与另外一些史书记载不符,或与其重要的交通、战略位置及唐据有的时间段内发生的史事均相矛盾。

第一,《新唐书·地理志》卷40 鄯州西平郡条、《通鉴》卷213 开元十七年条胡注等相关记载与《释迦方志》等所记不符。

最早记载唐蕃道路者,为唐初道宣《释迦方志》,该书《遗迹篇第四》记载通印度的道曰:

其东道者,从河州西北度大河,上漫天岭,减四百里至鄯州。又西减百里至鄯城镇,古州地也。又西南减百里至故承风戍,是隋互市地也。又西减二百里至青海……海西南至吐谷浑衙帐……又南稍东至吐蕃国。

唐鄯州治今青海乐都碾伯,鄯城镇在今西宁市,而承风戍的位置今学界认为在今青海拉脊山口。这里道宣所记从鄯城镇至青海湖西南岸的吐谷浑衙帐约三百里间其中就无记途经赤岭,其道似乎并非经日月山口,而是其南途经隋承风戍的一道。严耕望先生注意到此,但因不能解释其与途经赤岭道的关系,只好提出疑义曰:“承风、树敦间,盖亦中经赤岭与?”<sup>③</sup>

其实,从湟水流域向西南进入青海湖南区通向吐蕃的道路,除可穿越今湟源县日月山口外,还可经今湟中县南境穿越拉脊山口往来,即从今湟中县至贵德县(唐廓州境);或从乐都(唐鄯州治所)西南行至贵德境拉脊山南口,渡过黄河西南行;另外可取青海湖北岸绕湖而西南行。这几种走法均可绕过今日月山口。这几种走法与该地区今天的交通格局也是一致的,而此与传统认为的唐蕃道路必经日月山的认识是不相符的。其次,比《新唐书》、《通鉴》胡注、《唐会要》撰成时间更早的史书,如《通典》、《元和志》及《旧唐书·地理志》所记鄯州境内的道路四至及地理军防,亦均无记石堡城和赤岭,且后二书所记皆为“振威军”而非“振武军”;另《唐六典》亦无记赤岭与石堡城,所记陇右七军虽有振武军,但按其自北而南罗列开元后期各军地理位置的次序,振武军为莫门军后最南一军,其位置应该也不在鄯州境内。

第二,史籍所载石堡城的位置与开元十七年唐初据有石堡城前后的史事相矛盾。

《通鉴》卷213 开元十七年载:

(三月)甲寅,朔方节度使信安王祜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据之,侵扰河右。上命祜与河西、陇右同议攻取。诸将咸以为石堡据险而道远,攻之不克,将无以自还,且宜按兵观衅。祜不听,引兵深入,急攻拔之,乃分兵据守要害,令虏不得前。自是河陇诸军游奕,拓境千余里。上闻,大悦,更名石堡城曰振武军。

这里记载石堡城“据险而道远,攻之不克”,其险绝难攻与地当要冲的位置自不待言,而称“道远”却很难理解。若据前引《新唐书》与今学者论述,石堡城位于鄯州西南三百零七里,其以

① 以上所引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83,1985年,第529—532页。

② 参见崔永红等:《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

③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第533—534页。

东尚有唐定戎城、绥戎城、河源军等,皆部署在石堡城与鄯州间的大道上,密迩相间,烽燧相望,何谓“道远”?其次,若唐最初据有石堡城的时间为开元十七年不误,在此之前唐军是很难在石堡城以西以南活动的,但此与史书记载的相关史事是相矛盾的。一是《通鉴》开元十五年载:“春,正月,辛丑,凉州都督王君奂破吐蕃于青海之西……去冬,吐蕃大将悉诺逻寇大斗拔谷,进攻甘州,焚掠而去……悉诺逻至大非川……君奂与秦州都督张景顺追之,及于青海之西”;二是《通鉴》开元十六年又载:“秋,七月,吐蕃大将悉末郎寇瓜州,都督张守珪击走之……忠亮追之,拔其大莫门城,擒获甚众,焚其骆驼桥而还。”这两条中,“青海之西”与“大非川”、“大莫门城”、“骆驼桥”都在石堡城西南,如果《通鉴》记载的这两次行军史实不误,则唐军在没有占据石堡城的前提下,是很难进入石堡城以西、以南活动的。

同样,史籍所载石堡城的位置与天宝八载哥舒翰再次攻拔石堡城前后的史事相矛盾。一是《通鉴》天宝元年载:“十二月,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奏破吐蕃大岭等军;戊戌,又奏破青海道莽布支营三万余众。”<sup>①</sup>吐蕃大岭军在九曲地区,“青海道莽布支营”为吐蕃驻扎在青海湖畔的军队,石堡城若在今日月山附近,而开元二十九年已为吐蕃占领,则天宝元年不知唐军是如何到达以上地区作战的?二是《通鉴》天宝五载载:“以王忠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兼知朔方、河东节度事……与吐蕃战于青海、积石,皆大捷。又讨吐谷浑于墨离军,虏其全部而归。”<sup>②</sup>这里明确记载天宝五载,王忠嗣与吐蕃的战事已深入至青海湖区,若天宝五载尚未占有石堡城,唐军同样是很难在这一带活动的。三是《通鉴》天宝七载载:“(十二月)哥舒翰筑神威军于青海上,吐蕃至,翰击破之。又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谓之应龙城,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sup>③</sup>此条也说明,天宝七载,唐军已经在石堡城以西的青海湖区活动了,若石堡城在日月山一带,则其地位同样并非如史书所言的那样险绝和无以取代,而且唐开元、天宝之际,应该是包括整个青海湖区及其东南地区为唐控制的地区,该地区内也就不会有一个为吐蕃占据而孤立存在的石堡城。

## 二、对甘南羊巴城为唐石堡城的论证

史籍所载石堡城位置与历史史事的矛盾,让我们不得不对部分史书记载其位置的可信性提出质疑。同时,对已有学者提出的唐石堡城应该在今甘肃省卓尼县羊巴城的提议也不得不重新认真对待。

唐石堡城在今甘肃省卓尼县羊巴城的说法,最早为《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发表李振翼、马明达《甘南卓尼县〈唐李将军碑〉考略》一文,文章附有著名史学家赵俪生先生书写的一段前记,先生介绍了李、马二人此文是如何合作撰成的,且谓“此事首尾与从中牵合,皆出自我手”。赵先生虽未对该文观点予以评价,但经他的指导和支持的态度已十分明确。李、马此文,对唐石堡城在青海日月山东侧的传统说法提出了疑义。文章通过对“李将军碑”与该地出土的另一碑文“八棱碑”的研究,提出:“‘题石堡城’字样赫然在目,这样一座碑立在羊巴城中,自然对认为羊巴城即唐石堡城的说法,是一个有力的物证。”接着,包寿南、孙显宗二先生亦先后撰文,认为题名《石堡战楼颂》的八棱碑及卓尼县康多公社发现的“振武亭侯”方印,给否定石堡城

① 《资治通鉴》卷215,玄宗天宝元年。

② 《资治通鉴》卷215,玄宗天宝五载。

③ 《资治通鉴》卷216,玄宗天宝五载。

在青海之说和肯定石堡城在今甘肃省卓尼县府西四十里洮河南岸的羊巴城提供了证据。<sup>①</sup>继之《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又发表李振翼先生《唐石堡城方位之我见》一文,先生结合对两处石堡城遗址的实地调查,提出:“(青海)哈城堡下有两条小溪(即湟水支流药水的源头)会于村前,可以凭落石而渡,并无涧可隔,不足为天堑屏障……地面更无古代残城垣遗迹可寻……至今尚未发现可以确定为唐代的文物……从以上情况看,一直被外界误传为唐石堡城的哈城,确是一座明、清以来的小城堡。而‘大方台’,则很可能是近古以来大型寺院房屋建筑的院落遗迹。”相反,李先生对于羊巴城遗址实地调查后言:“羊巴城的城垣……在年代上,应属于唐代形制是没有问题的……所有这些文物,都为我们进一步证实此城是唐代古城无疑。”

以上是诸先生对于羊巴城的地理位置、地形地势、城垣形制,以及出土文物等方面的实地调查,应该说已为我们提供了足以证明羊巴城为唐石堡城的可信而可靠的实物证据。但遗憾皆未能通过唐前期与吐蕃战争的史事背景和军事地理的角度深入挖掘,以致说服力单薄,甚至陷入自我矛盾,招致一些学者的质疑和否定。<sup>②</sup>那么,结合这些调查与文物资料,是否可以从史籍文献和军事地理的角度得出羊巴城为唐石堡城的合理结论呢?

第一,开元十七年,信安王祿攻拔石堡城的史事与该年发生在洮州的有关史事相符。

唐代的洮州,治今临潭县境,辖今卓尼、临潭一带。<sup>③</sup>《元和志》卷39载:“洮州,临洮。下……武德二年复于此置洮州。贞观四年,州移理故洪和城,于此置临洮镇,五年废镇置淳州,八年废州,复移洮州理此。永徽元年置都督府,开元十七年废入岷州。二十年于临潭又置临州,二十七年又改为洮州。广德元年陷于西蕃。”两唐书《地理志》亦有大致相同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隋唐以来洮州地区即为中原王朝所经理和重视。但不知为何,自开元十七年起发生了连续数次的变迁,该年州废,以县隶岷州,二十年复置,更名临州,二十七年复故名洮州。那么开元十七年以后何以有这一系列的变化?再考察该时期曾设于洮河沿岸的两军建置变迁,似乎以上诸问题与该时期发生在洮州的某种事变之间都有关联。

唐前期,在洮州境内设置有莫门军。《唐会要》卷78莫门军条曰:

莫门军,置在洮州,仪凤二年置军。开元十七年,洮州移理临洮军,百姓隶岷州,置临州。二十七年四月,又改为洮州,今为临洮军是也。

唐前期在洮河下游的兰州狄道县另设有临洮军,《唐会要》卷78临洮军条言:

临洮军,置在狄道县,开元七年移洮州县,就此军焉。

唐长孺先生将《唐会要》“临洮军”此条之“开元七年”,经与各书校对后认为应该为“十七年”之讹。<sup>④</sup>结合唐先生的驳正与前引史书所载唐洮州的建置沿革在开元十七年的变化,我们得出,唐洮州建置及其境内的莫门军在开元十七年均发生了重大变化。

开元十七年洮州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考察该时期的唐蕃关系,正是双方关系的一个紧张时期。史书记载,从开元十四年起,吐蕃曾数次大规模入侵唐境,直至开元十八年吐蕃遣使求和,开元二十二年双方在金城公主的斡旋之下于赤岭分界立碑,战争方告一段落。在此期间

① 参见包寿南:《石堡城辨疑》,《西北史地》1982年第1期;孙显宗:《也谈唐石堡城遗址》,《西北史地》1983年第2期。

② 参见曾毅、温彬、永吉:《关于唐石堡城的地理位置问题》,《西北史地》1983年第2期;陈小平:《唐石堡城地理位置考索——兼驳甘肃卓尼县羊巴城即石堡城址说》,《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等文。

③ 关于唐洮州与临潭县的治所位置,学界有争议,但从开元十七年唐始攻拔吐蕃石堡城置振武军等史事及今临潭县附近古城址的调查等分析,应该是唐初就在今洮河北岸临潭县境,具体论证笔者另有撰文。

④ 参见唐长孺:《唐兵志笺正》,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8页。

吐蕃有无进攻洮州之事,汉籍不见记载,但敦煌藏文文书《大事纪年》于唐开元十七年记曰:“及至蛇年。夏……论·结桑东则布等于木垒九垒作战,击唐军多人。冬……唐廷使者李总管前来致礼……清点预备军增损之数字。”<sup>①</sup>“木垒九垒”为何地不得而知,但有学者就认为“应即石堡城地段”。<sup>②</sup>综合这段时间的双方关系,以及洮州及莫门军的变化,正说明开元十七年唐蕃双方在该地区曾发生过一场不被汉籍记载的大规模的战争。而汉籍不载的原因,应该就是当时唐廷实录史官为唐军的大败所作的隐讳。

那么,以上对于开元十七年唐蕃洮州发生大规模战争的考述,与唐石堡城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其中的关联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有了开元十七年吐蕃大规模入侵洮州之事,才有了该年河西、朔方军对于陇右军的赴援,时任朔方节度使的信安王祗才有机会率领朔方军攻拔在陇右境内的石堡城。该年三月,吐蕃大规模入侵洮州,莫门军及洮州军民不能抵敌,被迫撤离,紧急之际,河西、朔方军闻讯迅速支援。在唐军取得初步胜利后,朔方大总管信安王祗坚持率领唐军沿洮河长驱深入,最后对洮河上游吐蕃据守的石堡城进行了分兵包围。经残酷争夺后,唐军最终拿下了石堡城这一严重威胁洮州及其以东唐境安全的战略要地。对此,《旧唐书·吐蕃传》载:“十七年,朔方大总管信安王祗又率兵赴陇右,拔其石堡城,斩首四百余级,生擒二百余口,遂于石堡城置振武军。”<sup>③</sup>这里只记了唐军的胜利,但作为攻方的唐军付出的代价依然讳而不书,其实应该是更为惨重。石堡城为唐军攻克以后,史载:“自是河陇诸军游奕,拓境千余里。上闻,大悦,更名石堡城曰振武军。”<sup>④</sup>由此论证,将石堡城视为洮河南岸的羊巴城,与开元十七年信安王祗攻拔其城的史事及与之相关的史事之间是彼此相符的。

第二,羊巴城的险绝形势与唐军数次以巨大牺牲争夺的史事相符。

李振翼、马明达先生文对于羊巴城的险绝形势的描述是这样的:“洮河自寺布车东流至河北的巴木村前,因录巴山余脉自南而北延伸出来一突兀之奇岗,致使河水绕着它转而北流,折而南下,再往东流,在此形成‘几’型流向,遂使羊巴成为一个三面险绝,唯一径可通的特有地形。”<sup>⑤</sup>此对于羊巴城险绝形势的描写与我们的实地勘察,与史书记载的唐石堡城地形及唐历次争夺石堡城的艰难史实是相符的。

开元十七年唐军攻拔石堡城以后,《唐会要》振武军条继载石堡城,“(开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六日,盖嘉运不能守,遂陷吐蕃”。对于吐蕃这次再克石堡城,《通鉴》开元二十九年载:“六月,吐蕃四十万众入寇,至安仁军,浑崖峰骑将盛希液帅众五千击破之……十二月,乙巳,吐蕃屠达化县,陷石堡城,盖嘉运不能御。”此似将两次战争混淆,但另据《旧唐书·吐蕃传》载:“二十九年……六月,吐蕃四十万攻承风堡,至河源军,西入长宁桥,至安仁军,浑崖峰骑将盛希液以众五千攻而破之。十二月,吐蕃又袭石堡城,节度使盖嘉运不能守,玄宗愤之。”<sup>⑥</sup>此也为敦煌古藏文文书《大事纪年》所印证,是书载:“及至蛇年(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夏,赞普以政务出巡临边。陷唐之城堡达化县……冬,赞普牙帐自边地还至札玛。没庐·谐曲攻铁刃城,克之。”<sup>⑦</sup>铁刃城即石堡城。这也说明吐蕃屠达化县在六月,而袭破石堡城在十二月,分别为两次

①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6页。

② 薛宗正:《吐蕃王国的兴衰》,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③⑥ 《旧唐书》卷196《吐蕃传》。

④ 《资治通鉴》卷213,玄宗开元十七年。

⑤ 李振翼、马明达:《甘南卓尼县〈唐李将军碑〉考略》,《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⑦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97页。

进攻,两个方向。该年六月吐蕃自廓州达化县渡黄河北犯,途经承风堡至河源军,并不经过日月山。十二月,从南道又袭破石堡城。这次双方为争夺石堡城都投入了很大兵力,并为之不惜付出巨大牺牲。

开元二十九年石城堡陷落吐蕃后,惊动了唐朝廷,“玄宗愤之”。此后为了重新占领石堡城,玄宗及其将帅为之颇费筹划和几经努力,并不惜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史载,天宝四载,“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与吐蕃战于石堡城,为虏所败,副将褚诤战死”。<sup>①</sup>敦煌古藏文文书《大事纪年》亦载:“及至鸡年(玄宗天宝四年)……唐廷元帅马将军引廓州之唐人斥堠军至。王甥吐谷浑小王、论莽布支二人攻击巴堡垒,引军追击来犯之唐廷斥堠军……唐军大半被歼。”<sup>②</sup>可见,天宝四载唐军为攻取石堡城虽然不遂,付出的代价却是惨重的。

天宝四载,皇甫惟明攻取石堡城失败后,随即就被玄宗借故贬杀,继任陇右节度使的王忠嗣虽然身兼四节度,但因为不能收复石堡城而令玄宗十分不满。史载:“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今顿兵其下,非杀数万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失亡,不如且厉兵秣马,俟其有衅,然后取之。’上意不快……忠嗣言:‘今以数万之众争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乎!’”<sup>③</sup>这里王忠嗣处于实际情况的考虑和爱惜部属将士生命的缘故,其意见本来是十分中肯的,但为其得失而宵衣旰食的玄宗竟不惜将士的生命誓要攻取,旋即再次借故贬黜王忠嗣为汉阳太守,另授哥舒翰为陇右节度使而继续推行其强行攻取石堡城的计划。

最终,至天宝八载,玄宗再次授命哥舒翰攻取石堡城。对于此次攻取的艰难与唐军付出的代价,两唐书《王忠嗣传》皆有记载,《通鉴》卷216 天宝八载云:

上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东兵,凡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险绝,惟一径可上,吐蕃但以数百人守之,多贮粮食,积橐木及石,唐兵前后屡攻之,不能克。翰进攻数日不拔,召裨将高秀岩、张守瑜,欲斩之,二人请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获吐蕃铁刃悉诺罗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数万,果如王忠嗣之言。

这次哥舒翰为夺取石堡城首先投入了六万三千人的庞大兵力,并逼迫负责攻城的两位下属裨将立下了三日攻克军令状。结果正如王忠嗣所言,唐军“士卒死者数万”,伤者应该更是无计其数。与之相比,吐蕃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有限的,“但以数百人守之”,只是在战前“多贮粮食,积橐木及石”,最后被唐军俘获的也只有悉诺罗等四百人。这更加显示,双方所据地形地势的优劣为这次战争中攻守险易的决定性因素。而这一因素也就成为我们辨识石堡城的一个先决条件与关键因素。今羊巴城的险绝地形恰与之相符,而青海日月乡哈城遗址,经我们实际调查与多位学者的查勘,“古城址坐落在土坎上,周围地势开阔,从最近湟水处计算,土坎相对高度不过二十米……哈城为一土城,并不‘险绝’”,<sup>④</sup>“形势之险不如宋白所言之甚”,<sup>⑤</sup>橐木及石积之无所用,“不足为天堑屏障”,<sup>⑥</sup>种种显示,其与唐军攻拔时的险绝地形、地势及唯一径可通的道路情况不符。

① 《资治通鉴》卷215,玄宗天宝四载。

②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98页。此处“巴堡垒”,现临潭旧城藏语叫“瓦寨”或“巴寨”,“瓦、巴”是藏语方言音所致。而由此亦见唐洮州城与石堡城并非一城,此次战争是在二城之间展开。

③ 《资治通鉴》卷215,玄宗天宝六载。

④ 孙显宗:《也谈唐石堡城遗址》,《西北史地》1983年第2期。

⑤ 周希武著、王晶波点校:《宁海纪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⑥ 李振翼:《唐石堡城方位之我见》,《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

### 三、石堡城的交通、战略位置与唐蕃殊死争夺的原因再探

前面探讨了因石堡城的险绝地形,唐军多次为争夺石堡城所付出巨大牺牲,令人深思的是,唐蕃双方为之殊死争夺的动机和原因何在?

首先,上引李振翼先生文引用《洮州厅志》对于羊巴城重要的交通战略位置已有详细的描述。而对于唐洮州地区四通八达的交通地位,严耕望先生亦有论述。<sup>①</sup>另外,唐代廓州与洮州中经九曲地区也有道路连通,刘满先生结合实地考察考证天宝十三载哥舒翰设立的曜武军治所应在吐蕃北犯廓州的隆务河谷地,今保安乡境。<sup>②</sup>综合诸家所述,洮州西通黄河九曲地与吐蕃境,西南通叠州、剑南,西北通河州、廓州,东通岷州、渭州,东北通兰州等,尤其吐蕃经此绕过河湟谷地唐军密集区,取道岷洮道向东或东北,即可直取唐陇右监牧,或取道渭州、秦州威逼关中唐廷腹地,故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正是由于羊巴城所在的洮州地区有如此重要的交通、战略地位,自唐以来,该地屡屡为唐与吐谷浑、吐蕃争战的军防要地和各政权出兵所取之路。仅唐前期与吐蕃战争期间,贞观八年(634)、仪凤元年(676)、仪凤二年、证圣元年(695)、开元二年、开元十五年等战事皆主要在洮河地区展开。另据敦煌古藏文文书《大事纪年》载:牛年(长安元年,701),吐蕃“引兵至松州、洮州”;虎年(开元二年,714),“盆达延与大论乞力徐二人引上军劲旅赴洮州”;羊年(天宝十四载,755),“论绮力卜藏、尚·东赞二人攻陷洮州城堡……引劲旅至洮州”。<sup>③</sup>可见,唐前期唐蕃陇右兵争大部分时间就在该地区展开。

其次,石堡城的争夺与唐蕃争夺黄河九曲地有直接的关系。睿宗朝以来,唐与吐蕃之争的一个焦点,就是黄河九曲地。而石堡城以西即为九曲地区,洮州石堡城实乃唐西取河西九曲地的一个关隘,也为吐蕃守卫九曲地区的一个屏障与北犯唐洮岷地区的一个桥头堡。黄河九曲地,又称河西九曲地,为黄河上游西端回环曲折的地区,古有“河曲”、“九曲”或“河西九曲”之称。但在唐与吐蕃之争期间,仅指今天青海省境内共和县至循化县沿黄河一线以南、唐洮州以西的地区。该地区本属唐境,宜于屯牧,唐前期该地区居住着党项、吐谷浑、吐蕃等族,曾为唐阻止吐蕃东扩的一道天然屏障。该地区引起唐蕃双方争端的过程,《通鉴》睿宗景云元年(710)载:“姚州群蛮,先附吐蕃,摄监察御史李知古请发兵击之;既降,又请筑城,列置州县,重税之……群蛮怨怒,蛮酋傍名引吐蕃攻知古……由是姚、嵩路绝,连年不通。安西都护张玄表侵掠吐蕃北境,吐蕃虽怨而未绝和亲,乃赂鄯州都督杨矩,请河西九曲之地以为公主汤沐邑;矩奏与之。”<sup>④</sup>对于河西九曲地的失去,《旧唐书·吐蕃传》载:“吐蕃既得九曲,其地肥良,堪顿兵畜牧,又与唐境接近,自是复叛,始率兵入寇。”<sup>⑤</sup>可见,河西九曲地区,不仅为肥美的牧场,也是连接今川西姚、嵩等州羌蛮各族的通道,吐蕃得到唐河西九曲之地,不仅得到了肥美的驻牧地,加强了其与西南附属部族的联系,而且在此“堪顿兵畜牧”,兵锋可直逼唐境。正因此,随后开元二

① 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第548—550页。

② 参见刘满:《西北黄河古渡口考(一)》,《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1期。

③ 参见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92—99页。

④ 《资治通鉴》卷210,睿宗景云元年。

⑤ 《旧唐书》卷196《吐蕃传》。

年,吐蕃就取道洮州,进攻唐兰、渭等州,掠取唐陇右监牧。至此,唐已悔之晚矣。对此,正如有学者言:“吐蕃得九曲之地后……整个陇右南部地区也完全暴露在吐蕃威胁之下,此后,吐蕃便屡次从九曲之地东犯唐境。”<sup>①</sup>这样,黄河九曲地的失去,即是唐领土与战略要地的失去,也是唐在吐蕃面前因外交失败而受辱的隐痛之处。

九曲地的失去,是唐朝廷外交的极大失误,但要收复九曲地,石堡城就为其首先要收复的要塞,所以石堡城的争夺从玄宗朝双方争夺九曲地区期间始频繁出现于史册。也正因此,直至天宝八载唐再次占领石堡城之后,天宝九载十二月,“关西游奕使王难得击吐蕃,克五城,拔树敦城”,<sup>②</sup>又在九曲地西端打开了进兵缺口,这样就为唐东西夹击,攻取黄河九曲地做好了准备。最终,天宝十二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击吐蕃,拔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九曲部落”。<sup>③</sup>

哥舒翰克复河西九曲地以后,为了牢固控制该地区,《通鉴》天宝十三载载:“秋,七月,癸丑,哥舒翰奏,于所开九曲之地置洮阳、浇河二郡及神策军,以临洮太守成如璆兼洮阳太守,充神策军使。”<sup>④</sup>以临洮太守兼洮阳太守,正是为了使其与此时的临洮郡呼应配合,巩固对九曲地区与石堡城的牢固占领。至此,石堡城与唐黄河九曲地的关系,唐几度不惜花费巨大代价夺取石堡城的原因,应该一一有了较为明晰的答案。

#### 四、唐代赤岭位置及河州、洮州南通吐蕃道考

赤岭,为唐开元二十二年唐与吐蕃划界树碑之处,而且在唐蕃战争期间,因其位近双方殊死争夺的战略要地石堡城而长载史册。其位置,《通典》、《元和志》、《旧唐书·地理志》不载,前引《新唐书·地理志》卷40 鄯州西平郡条曰:“石堡城……又西二十里至赤岭,其西吐蕃,有开元中分界碑。”《通鉴》卷213 胡三省注:“宋白云:石堡城,在龙支县西,四面悬崖数千仞,石路盘屈长三四里,西至赤岭三十里。”联系前面考证,是不是历史上的石堡城与赤岭不在一处?或者是历史上有两个彼此无关的石堡城和赤岭,但被史书记载张冠李戴了呢?

首先,考察学界对于唐代赤岭为今日月山之说的来源,最早为日本学者佐藤长承袭法国学者石(史)泰安之说,所谓:“史泰安1952年有‘赤岭’等于日月山之说,并说此山是藏文文献上的Rme ru(《TA》p75. n. 212)。”<sup>⑤</sup>但据著名藏学家吴均先生研究,藏史上有于唐境公谷梅如地方凿岩石为日月图像,以象征“在天为日月,在地只甥舅”,但“梅如并不是今青海日月山,这一点毫无疑问”。至于今日月山之得名,“据传乃源于文成公主入藏之故事,普遍流传则在17—18世纪。它只是一首美丽的动人心弦的诗歌素材……史泰安之论断,混淆时间之先后,无视政治军事势态之变化及地区之歧异”。<sup>⑥</sup>其实,正如吴均先生所考,藏史上关于唐蕃划界及刻画日月之形的事迹来源于著名的藏文史书《贤者喜宴》,但该书所记与唐蕃长庆会盟混同,其中记当时在汉地一个名曰孔谷梅如(gong-gu-rme-ru)的地方作为唐蕃边界,并修建了一座赞普寺院,一座唐皇寺院,所谓:“此即天有日月一双,地有赞普甥舅,除此之外别无它有。和议

① 崔永红等:《青海通史》,第190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6,玄宗天宝九载。

③④ 《资治通鉴》卷216,玄宗天宝十二载。

⑤ [日]佐藤长:《青海与拉萨间的道程》,《西藏历史地理研究》,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141页。

⑥ 吴均:《对日本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中一些问题的商榷》,《吴均藏学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3—424页。



之后,遂于磐石之上(刻以)日月之形……其时赞普年十七岁,唐穆宗执政。”<sup>①</sup>此孔谷梅如其他汉藏文献不载,但根据汉籍记载,长庆会盟基本维持了公元783年清水会盟的汉藏边界,而此时,鄯州及整个唐陇右节度使辖区早在肃宗上元二年(762)前后几乎尽陷吐蕃,显然所谓“孔谷梅如”就不可能在唐鄯州,何有唐蕃划界于日月山之事实?<sup>②</sup>由此,今青海日月山之得名确非唐蕃分界的史事,而是源于后世文学诗歌素材。

其次,史书关于赤岭的明确记载,最早见于北魏《宋云行记》云:“初发京师,西行四十日至赤岭,即国之西疆也,皇魏关防正在于此。赤岭者,不生草木因以为名。其山有鸟鼠同穴……发赤岭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浑国。”<sup>③</sup>依此,严耕望先生认为宋云一行途经湟水谷地,而赤岭就在今青海日月山。<sup>④</sup>但笔者认为,神龟元年(518)宋云一行西行西域所走的道,应是东晋南朝以来僧侣常取的丝绸之路河南道,该道途经洮岷地区,南达蜀川,东通长安、洛阳,向西途经与南朝、北魏都有较好关系的吐谷浑境,可直取西域南道西去。该道与该时期的河西至西域道路相较,不仅途程较近,而且可绕开与北魏关系紧张的高车和柔然政权,也完全无需绕道湟水谷地和途经日月山。另从北魏此时的西疆来看,唐代的洮州地区,正是北魏枹罕镇将所辖而与吐谷浑接壤的一“关防”之地,因就在稍前的北魏太和十五年(491),北魏命其枹罕镇将长孙百年攻拔被吐谷浑占领的洮阳、泥和城(即洪和城)二戍,<sup>⑤</sup>说明双方边界也正在此。再者,从“发赤岭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浑国”句看,此赤岭与位在青海湖区的吐谷浑国境或其牙帐也还很远,而且要途经“流沙”才能到吐谷浑国。而此又正与当时的河南道从洮岷地区向西途经今甘南境内的红山区,以及今青海贵德南的流沙区,徒步约二三十天才能到达当时吐谷浑衙帐伏俟城等事实一一相符。因此,《宋云行记》所记“赤岭”绝非近在青海湖咫尺的日月山,而应该位在洮岷地区。

史书对于赤岭的明确记载,也见于唐蕃赤岭分界的史事。史书多处记载到开元二十二年唐蕃双方为划界树碑于赤岭。这些记载均未涉及此赤岭的方位,但从碑文内容来看,划界立碑之地必然是双方有争端之地。《册府元龟》卷979《和亲二》及《全唐文》卷990皆收录有这次划界的碑文,其中言:“维大唐开元二十一年,岁次壬申,舅甥修其旧好……赤岭之外,其所定边界一依旧定”。这里所谓“旧定”,是指唐中宗神龙二年划定的边界。显然,此次划界有变动处仅仅是近来双方有争端的九曲地。前已论及,自睿宗朝以来,唐蕃之争主要在九曲地,开元二年至十七年唐蕃战争最激烈的地区又在九曲以东的洮河流域。因此,这次赤岭划界必然是为平息双方在该地区的激烈冲突,以及明确九曲地区的归属。由此,划界树碑处必然在九曲地东界。

另外,《新唐书·娄师德传》记载:“上元初,为监察御史,会吐蕃盗边,刘审礼战歿,师德奉使收败亡于洮河,因使吐蕃。其首领论赞婆等自赤岭操牛酒迎劳。”明确记载娄师德出使地为洮河,而吐蕃首领又在赤岭操牛酒迎劳,应该就是明确标明了赤岭就在洮河一带。

① 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8页。

② 而今甘南合作市东有佐盖多玛与佐盖曼玛二乡,古为藏族上下二庄,前者藏语音“麦仁”(或梅如),是上庄的意思;而“孔谷”为该地一山谷的名。若《贤者喜宴》所提唐蕃划界的“孔谷梅如”为开元年间的记事,就应该在今甘南合作市境内,而与我们的论证相符。

③ 范祥雍校注:《洛阳伽兰记校注》卷第五附录《宋云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251—252页。

④ 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第532页。

⑤ 参见《魏书》卷7《高祖纪下》。

史书还有一条赤岭的资料。《通典》卷190《吐蕃》目记载吐蕃境内可跋海曰：

有可跋海，去赤岭百里，方圆七十里，东南流入蛮；与蛮西二河合流而东，号为漾濞水，又东南出会川为泸水焉。

此记载与《唐会要》卷97记载略同。此二书所记的可跋海流向都与吐蕃国境东北部，唐洮州至川西地区的河湖特征、古代对该地区的民族及河流的称谓都十分吻合。<sup>①</sup>其位近赤岭，应该也是标明二者就在唐洮州及今川西一带。

再次，考察唐以来有关行人行程的记载，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有关石堡城与赤岭方位的可信资料。唐中后期，唐使吕温、刘元鼎曾先后出使吐蕃，他们的行程对于说明赤岭的位置、赤岭与石堡城的相对里距，以及与一条连通河州与黄河河源，途径赤岭、石堡城而直通吐蕃的道路都有直接的关系。后者《新唐书·吐蕃传》载：

元鼎逾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隳，兰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至龙支城……过石堡城……崖壁峭竖，道回屈，虏曰铁刃城，右行数十里，土石皆赤，虏曰赤岭。而信安王祗、张守珪所定封石皆仆，独虏所立石犹存。

这里明确记载石堡城、赤岭，以及唐蕃双方划界的界碑，而且赤岭就在石堡城以西数十里。对于刘元鼎此行所取之道，严耕望先生考证言：“吕温、刘元鼎先后出使吐蕃，其去程皆取此道（经鄯州河源军道），但回程则取道河州大夏川也。”<sup>②</sup>

其实，刘元鼎往返皆未取经鄯州河源军道，而是往返皆取经河州、洮州南通吐蕃的一条道，上引文所提各地显然为元鼎一行去程的先后记述。对此《旧唐书·吐蕃传》明载：“元鼎往来蕃中，并路经河州……是时元鼎往来，渡黄河上流。”<sup>③</sup>而且，从文献记载元鼎往返，均未涉及日月山一带的任何见闻，只是在“龙泉”度过湟水时“西北望”而见杀胡川及“湟水出蒙谷，抵龙泉，与河合”的情景。对于他这次取道所经，《新唐书》记载其去程所经，继上引文至石堡城内容以下多有窜行和叙述颠倒之处。但经过辨析，剔除与本文无关的内容，可知元鼎一行从兰州西行后，在龙泉谷附近渡过了湟水。接下来应该才能叙述先后经过的龙支城、石堡城、赤岭等内容。但此处因与前引文窜行颠倒，而继渡过湟水后为“河之上流”句。这种先后窜行不清的现象，应该是编史者对于史料的编裁失当所致，而这种错误在《新唐书》中尚有许多。两书互校后可以看出，元鼎一行曾亲抵河源。而且去程在河源两处渡过黄河。另结合《新唐书》记“测其地，盖剑南之西”句，我们判断元鼎一行去程过赤岭、石堡城后，先是从大积石山（阿尼玛卿山）东南端，黄河绕山折而西北流的地方先渡过黄河，然后向南微西行三百里，于大积石山以南，黄河源头再次涉河后向西而去。这其间必然要穿过洮河流域，则上引文记载元鼎一行经过的石堡城、赤岭皆在该道上，史书此记准确无误。而且由元鼎一行所见的唐蕃分界的碑文，亦证明此赤岭就是唐蕃分界树碑的地点赤岭。

最后，赤岭经我们实地调查就在石堡城所在的唐洮州西境。前引史书多处记载，赤岭在石堡城以西二十里。而今卓尼县羊巴城以西二三十里的洮河北岸，北经临潭县与卓尼县西境直至今合作市东，就有南北纵贯的几条红土山。主要山峰如浆红坡、西凤山、大坡山、麻日山等，裸露的沙土赤红一片，且沿途如浆红坡、红山口、麻日山（藏语含义为红土山）等就取赤红之意。

以上论证了赤岭与石堡城一并在洮河上游唐洮州西境。现在，我们再来讨论途经赤岭与

① 据临潭县地方志志办的马廷义先生介绍，“苦拔海”、“可跋海”疑为今碌曲县郎木寺镇的“贡巴波海”。

②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第511页。

③ 《旧唐书》卷196《吐蕃传》。

石堡城的这条重要的交通线。首先,将上文论及的元鼎一行去程所经各点串联以后,这条路线的大致走向即可显现:成纪—武川—广武梁—兰州—龙支城—河州—赤岭—石堡城—大积石山东南—河源—吐蕃。此一去程路线,与经鄯州道相较是一南道。该道大部分较直,远较经鄯州河源军通吐蕃道为近。具体行程应该是自河州沿大夏河谷南下,至洮州境内的石堡城,沿洮河向西数十里至赤岭南端,折而南下至叠州,<sup>①</sup>再向西大约至今玛曲县境渡过黄河,继续向西经大积石山南至河源,最后向西而至吐蕃腹地,这是一条主线。另据前引汉藏文献记载,开元二十九年六月,吐蕃四十万大军先屠廓州达化县,北上攻承风堡,至河源军等,正说明这次吐蕃大军从河源地区经大积石山东南端北进,渡过黄河以后,不经洮、河二州,而是沿隆务河谷北上直至廓州,然后进入湟水谷地的。说明除经洮、河二州的主线外还有一条沿隆务河谷北上直至廓州的副线;而且还有向西北经九曲百谷城至宛秀军的副线;向东南至潘州、松州的副线。因贞观十二年,松赞干布亲率大军“进破党项、白兰诸州,帅众二十余万屯松州西境”。<sup>②</sup>也正是这些副线的存在,天宝十二载哥舒翰夺得九曲地之后,才设曜武军与武宁军分别驻防于隆务河谷与百谷城。此严耕望先生过去认为吐蕃东侵路线在该地区为沿黄河谷地行进的说法,以及其所绘吐蕃进入九曲地区与洮、岷、叠等州所取的路线都是不适当的,通过今天的实地调查,沿黄河谷地许多地方是不能通行的。

唐时期,元鼎出使吐蕃往返所取的这条河州至河源道,除长庆二年(822)刘元鼎出使往返外,该时期另有吕温于贞元末西使吐蕃,据其返程所做诗文所涉各地名,显然其归程就取道河源经洮州至河州道回归汉地的。而且也反映,该道自唐中期洮、河等陇右诸州为吐蕃占领以来,就是唐蕃双方往来的常取之道。

其实,追溯唐以来的历史,贞观九年,唐大规模出击吐谷浑,其中侯君集、江夏王道宗所率领的南路大军,就取此道至河源。对于这次唐军分南北二路大军出征的路线,日本学者佐藤长曾作了研究,遗憾的是,先生对史书记载错误理解后又妄加改动,谓李靖领军走的是南路,而侯君集、李道宗走的是北路,结果张冠李戴,全篇皆非。<sup>③</sup>后有学者严耕望等沿袭其说,以讹传讹。其实,对于这次唐军出征,史书多有记载。《旧唐书·吐谷浑传》明确记载侯君集与江夏王道宗“趣南路”,“达于柏梁(海),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即绕道大积石山以南到达了黄河河源地区。另外《新唐书·吐谷浑传》的记载尤详,曰:

贞观九年……夏四月……分二军:靖与大亮、薛万均以一军趣北,出其右;君集、道宗以一军趣南,出其左。……君集、道宗登汉哭山,战乌海,获名王……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乏水草,士糜冰,马秣雪。阅月,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积石山,览观河源……两军会于大非川。

对于这次行军的出发地点,《册府元龟》卷366有:“师次鄯州,君集言于靖曰……靖乃中分士马为两道并入”。则南路大军出发地点应该就在鄯州或其境内。而从鄯州沿湟水谷地南下,渡过黄河即为河州。另由《元和志》一条资料可知,这次行军还经过了洮州、叠州向西而去的。《元和志》卷39合川守捉条曰:

① 经实地调查,此处折而南下唐叠州的道今为车巴沟道与卡车沟道,而石堡城就处在吐蕃经此二道北渡洮河处。而由石堡城一带渡过洮河,向北取闹站沟道或旧城沟道可直达唐洮州、河州。

② 《资治通鉴》卷195,太宗贞观十二年。

③ 参见[日]佐藤长:《唐代李靖对吐谷浑的作战路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227—247页。对于佐藤长此误以及其对唐代青藏高原一些地名考证的误漏,已故藏学家吴均先生曾撰写了一系列的商榷文章,参见《吴均藏学文集》。

合川郡守捉,州南一百八十里,贞观中侯君集置,管兵千人。合川郡,今叠州。

合川郡即叠州,侯君集军过其地,对该地军防才有处置之权。此印证侯君集等所率南路大军当年就是经过叠州向西而去的。即这次征吐谷浑的南路大军就是取道这条河州至河源道,途经洮州、叠州,还经过赤岭、汉哭山、乌海、星宿川、柏海、至河源,其间从大积石山南绕道至山北,进而向北行至青海湖以南的大非川与李靖等率领的北路大军会师的。

其次,文成、金城二公主入藏路线虽不能确知,但至今甘南藏族地区亦有文成公主入藏途经该地的传说;金城公主入藏路线,据研究途经当时的吐谷浑中心地玛曲(黄河上游)、曼头岭等地,即今青海河曲一带。<sup>①</sup>

除唐朝使臣往返常取河州至河源这一南道外,吐蕃使臣也有取道该道来唐的明确记载。《通鉴》开元二年记载,“乙酉,命左骁卫郎将尉迟瓌使于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遣其大臣宗俄因矛至洮水请和,用敌国礼”。另外,前引大量汉藏文献关于吐蕃取道河州、洮州、叠州进攻唐境,以及唐蕃双方在该地区发生战争的记载,说明吐蕃进攻唐境就是常取此道。

查考唐以后的史书,《明史》记载了明代统治者对于洮岷地区连接内地与西藏交通地位的高度重视,对此吴均先生言:“由于洮岷地区有明一代肩负着对乌思藏之重任,故乌思藏各地方势力入京朝贡纳马,成化三年以前多从洮岷道出入。”<sup>②</sup>

另外,清初以汉文编纂的西藏地方志书《卫藏通志》,该书所记当时西藏四境站程,就有两条从两河口分别通往旧洮州或河州的道路站程情况。两道分别通向今四川西北部的诺尔盖县境内或今甘南合作市境内。<sup>③</sup>说明自唐至清代,这些道路的使用为相沿一袭,未曾中断。

查考前人研究,早期藏学家黄奋生先生在其《西藏情况》一书介绍藏区的交通,其中就有一条“藏青康川甘草地路线”,途径今岷县、临潭(洮州),而且先生言:“此为昔时唐蕃大道,近已废坏。”<sup>④</sup>另陈良伟先生在其著《丝绸之路河南道》一书中尤其关注到今人对于石堡城位置的争议言:“关于这座城址,有人认为是唐代的临潭县治,有人认为是盛唐时期非常著名的要塞石堡城。笔者倾向于认为这座古城当与蜀汉至西秦时期的沓水城、南北朝时期的西洮城、洮河上游流域的曾城有关,盛唐时期称石堡城。”<sup>⑤</sup>这里先生已从考古学的角度提出了合理的推论。

最后,反观《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其中记:“自振武军经尉迟川、苦拔海、王孝杰米栅,九十里至墨离驿”。这里自振武军后的几个地名,仅九十里间竟然经过几个大的地名,地名之间又不明里距,体例显然不合前后文。尤其,前引《通典》文谓“有可跋海,去赤岭百里”,显然仅此两地间就已经超过了九十里。而这里的尉迟川,杨铭先生结合日本学者佐藤长的考证言:“唐蕃古道河流名称。因鲜卑别部尉迟氏族众居此而得名;一说为藏语‘弯曲河’(dgur chu)或‘回旋河’(hkhör chu)的音译。”<sup>⑥</sup>而“弯曲河”按后面的音拼,应该是“道格儿曲河”,其在碌曲县拉仁关乡玛日村道格儿沟,为古今道必经之地;而“苦拔海”应该就是“可跋海”,前已考。而王孝杰米(木)栅,《旧唐书·娄师德传》载:“证圣元年,吐蕃寇洮州,令师德与夏官尚书王孝杰讨

① 参见周伟洲、杨铭:《关于敦煌藏文写本〈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的研究》,周伟洲著《唐代吐蕃与近代西藏史论稿》,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

② 吴均:《论明代河洮岷的地位及其三杰》,《吴均藏学文集》,第95页。

③ 参见(清)松筠:《卫藏通志》(同《西藏志》合刊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1—26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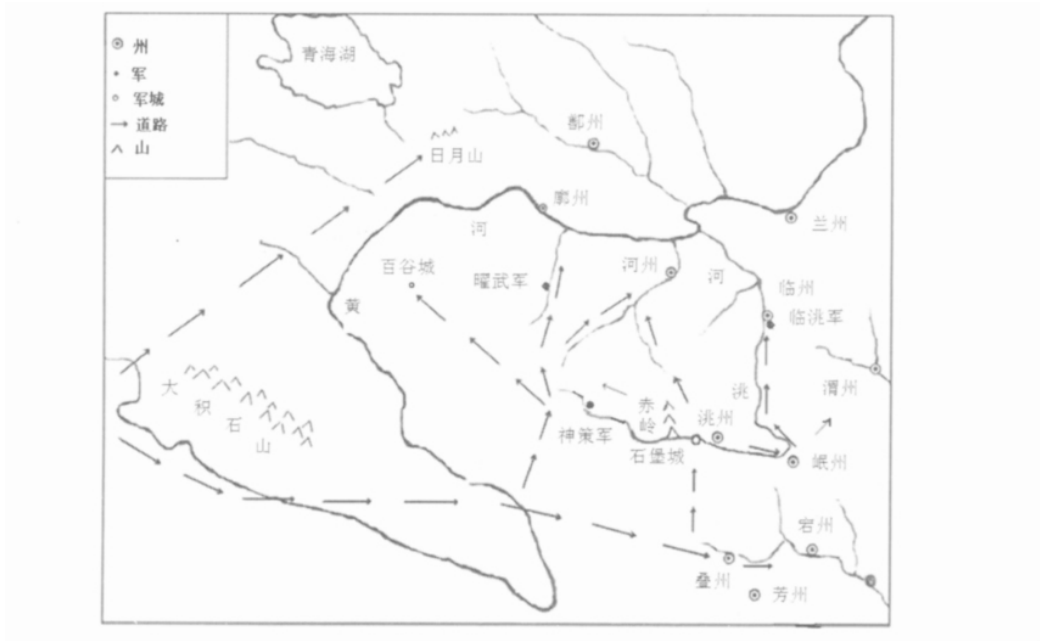
④ 黄奋生:《西藏情况》,地图出版社1953年版,第46页。

⑤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页。

⑥ 杨铭:《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210页。

之。与吐蕃大将论钦陵赞婆战于素罗汉山,官军败绩”。素罗汉山据《通鉴》胡注在洮州,则王孝杰米栅应该也在洮州。由此说明《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唐蕃道路,应该是掺和了几条唐蕃道的内容,其中在陇右就包括一条经鄯州的北道,另一条即洮州至河源通吐蕃的南道(或称洮岷道),途经石堡城、赤岭、尉迟川、苦拔海、王孝杰米栅等地。由此,《新唐书·地理志》对于唐蕃道路的记载,史料来源本弥足珍贵,对其出处和所涉地名则亟待一一考定,而史书记载出现如此重大混乱和错误的原因,还需深入探究。在此笔者推测,首先结合唐代史书如《元和志》等对于关涉边疆重大军事机密的军防信息,往往简陋,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应为史家的“讳饰”,<sup>①</sup>此应该也是史家的讳饰。其次,考虑到石堡城位处边疆,唐中期以后史官多已不明其地理,将地形或地名相近的地点混淆,所谓:“自吐蕃陷陇右积年,国家守于内地,旧时镇戍,不可复知。”<sup>②</sup>另,安史之乱政局板荡之际,唐朝国史实录出现了缺漏或失传现象。史载:“在兴庆宫史馆,并被逆贼焚烧”,后经至德、大历年间的搜访补修,但开元、天宝年间事,“十无三四,后人以漏略讥之”。<sup>③</sup>再者,《新唐书》作者着力于“文省于旧”,造成很多记述不清之处,也是学界的共识。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后世史家在对文献的处理中出现了混淆和缺漏。

唐代河州、洮州通吐蕃道示意图:



(本文曾得到李昌宪、马廷义、周伟洲等先生的指导或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 华祖根〕

① 唐长孺:《唐代兵志笺正》,第53页。

② 《旧唐书》卷138《贾耽传》。

③ 《唐会要》卷63《史馆上·修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2页。

sense; the holistic fertility was sought by Nuodeng people not only for themselves, but also for the others (their neighbors).

**Keywords:** fertility ritual; culture reason; holistic fertility; NuoDeng of YunNan.

### **A Re-Study on the Location of " Shi Bao Cheng" (石堡城) and " Chi Ling" (赤岭) and the Ancient Road Between Tang and Tubo in the Tang Dynasty ..... Li Zongjun(38)**

**Abstract:** The records from *Xin-Tang-Shu • Di-Li-Zhi* and *Tong-Jian* paraphrased by Hu Sanxing about the location of " Shi Bao Cheng" and " Chi Ling" in the Tang Dynasty was wrong.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above, some scholars made a wrong conclusion that the location of " Shi Bao Cheng" in the Tang Dynasty is next to " Ri Yue Shan" (日月山) in Qinghai province. Furthermore, they mistook " Chi Ling", the " Ri Yue Shan" in Qinghai province today, as the pass-by in the ancient road between Tang and Tubo. In fact, the " Longyou" (陇右) part of the ancient road between Tang and Tubo had two branches, one in the north and the other in the south, while " Shi Bao Cheng" and " Chi Ling" in the area of " taozhou" (洮州) in the Tang Dynasty distributed in the south branch road from " hezhou" (河州) and " taozhou" to " heyuan" (河源) linked to Tubo. This branch road was the main linking routeway between Tang and Tubo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 records about the ancient road between Tang and Tubo from *Xin-Tang-Shu • Di-Li-Zhi* is very expensive, however, also should be scan thoroughly.

**Keywords:** Tang Dynasty; " Shi Bao Cheng" ; " Chi Ling" ; the ancient road between Tang and Tub.

### **A Research on the Buddhist Title, Master and Merit Title and Degree Title in the Liao**

**Dynasty: Based on Stone Inscription ..... Zhang Guoqing(51)**

**Abstract:** Buddhism was extremely popular in the Liao Dynasty, with a large number of disciples converted to Buddhism as monks and nuns. It is recorded in the stone inscription that monks and nuns boasted their Buddhist titles, which could be granted only after they had submitted to all the precepts in Buddhism (they had been called by their secular names before receiving their Buddhist titles); some monks and nuns were conferred their Buddhist courtesy names while granted Buddhist titles; disciples or lay Buddhists who were of the same rank took the same first character in their Buddhist titles. Distinguished monks and nuns in the Liao Dynasty boasted " Master and Merit title", which was awarded by the emperor, only when they excelled at both morality and scholarship. " The Master" and " the Moral Master" with greater honor could be awarded four-character " Master and Merit title" in place of the previous two-character title. With " Master and Merit title", some distinguished monks and nuns could also be " cizi" (赐紫), that is, to be given an " honorable" position in the society, moreover, their disciples and kinfolds could benefit from the honor. There was difference between Master title and Merit title; the former focused on " scholarship", while the latter " administrative capacity". It was a prerequisite that they had been awarded " Merit title", so that they could be granted " Master title" further, that is, " Master title" was superior to " Merit title". Monks and nuns in the Liao Dynasty received " Degree title" on condition that they had had a good command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 Moreover, " Degree title" was classified. There were two major sorts: one was called " ×× Master title", the other was to " preach (meditate, murmur, recite and research the Buddhist scripture) ×××× Buddha( Bhiksu, Bhiksuni)". In the second sort of " Degree title", the title was classified into superior, medium, and junior degrees distinguished by the first character of the title.

**Keywords:** Liao Dynasty; monks and nuns; Buddhist title; Master and Merit title; Degree title; stone inscription.

### **On " Bi Li Shu Jiang" (毕力术江): A New Survey about the Location of " Qu Xian Wei"**

**(曲先卫) in the Ming Dynasty ..... Tuo Chaoqun and Liu Tiecheng(61)**

**Abstract:** The location of " Qu Xian Wei" and " Bi Li Shu Jiang" in the mid era of Ming Dynasty was an academic focus. After a study about it was done in 1928 by a Japanese scholar, Kuwata Rokurō, many scholars paid attentions to this issue. Among those, Wu Jun, a Chinese scholar, mainly contributed his work to spot " Bi Li Shu Jiang" at upper Yangtze River, which has had widely influence by now.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naming the place of Tibetan plateau and looking up relative historical materials thoroughly, more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the conclusion of scholars mentioned above have a lot of confusions. This paper finds out that " Bi Li Shu Jiang" is the Hubuha(湖布哈) River in Qinghai province, therefore the location of " Qu Xian Wei" and its relative places may also be determined.

**Keywords:** " Bi Li Shu Jiang" ; " Qu Xian Wei" ; name of place; Ming Dynasty.